



行的场面，但已无汉代出行场面的宏大气势。第二，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兴盛，反映时人宗教思想的题材在南朝画像砖墓中大有增加。比如，羽人戏龙和羽人戏虎中的龙、虎就是道家引导死者灵魂上天的工具；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受道家影响，在画像砖中实际上是以得道成仙榜样面目出现的^①。又如，南朝画像砖墓中大量出现的莲花纹装饰，以及飞天、佛像、供养人、莲花化生和僧人等图像，应是佛教思想观念在墓葬艺术中的反映。

隋唐五代时期墓室壁画题材比较突出的是四神、十二辰像和星象图的流行，另在五代时期还兴起了墓室仿木结构建筑彩画的艺术表现形式。

宋元时期墓室壁画题材内容的最大特点是世俗化和生活化。现实生活类的题材以表现墓主人生前居住的寝室图为主，出行图、庖厨图和乐队图也时有出现，但墓主人形象比较少见。表现宗教思想观念的四神、十二辰像和星象图在此期继续流行，且新出现了福禄寿三星的题材。装饰类的花纹题材少见莲花纹，而以饱满艳丽的牡丹花为主。

第五节 海上丝绸之路对墓室壁画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一词的概念最早由国外学者提出并使用。1913年，法国学者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首次提出“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② 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中正式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大批学者如季羨林、陈炎^③、刘迎胜^④等开始使用并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以及它在中西文化

^① 姚义斌：《六朝画像砖研究》，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7-108页。

^②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

^③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④ 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交流传播当中的意义和价值。

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省份。早在秦汉时期，中国沿海居民就与临近海岛屿及东南亚之间发生了联系。例如，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墓中出土的大象牙、象牙器、银器、玻璃器以及玛瑙、水晶、玻璃等多种质料的珠饰，其中有一部分应是从中亚或南亚等地输入的。可见，广州与海外通商贸易的时间至迟在南越王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①。又如，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发现的三片玻璃片，在器形风格上、纹饰上和质地上均与中国传统的玻璃（琉璃）不同，而与近代玻璃近似。根据激光光谱分析，此玻璃器皿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②。中外文化交流在汉代墓室壁画上比较明显的图像例证，应该是江苏徐州和浙江海宁画像石墓中的大量胡人图像了^③。

六朝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引，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沿海省份与域外诸国的交往更为紧密。东吴政权就十分重视海外贸易，黄武五年至黄龙二年（226—230），交州刺史吕岱遣中郎将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各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④。六朝时期的海外贸易颇为繁荣，有学者对海外诸国通使于六朝的次数做过统计，当时相互贸易往来的国家主要分布于三个地区：其一，海东诸国，主要有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等国；其二，西域和南亚诸国，主要有天竺、波斯、狮子国和滑国等；其三，南洋诸国，主要有林邑、扶南和老挝等国^⑤。六朝时期的海外贸易以东南沿海的广州、交州为中心，相互之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教造物的输入，如佛像、宝塔、舍利、菩提叶、佛器、佛经等源

① 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

② 纪仲庆：《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③ 朱泮：《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84-100页。

④ 参见（晋）陈寿撰：《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385页；（唐）姚思廉撰：《梁书》卷五十四《海南诸国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789页。

⑤ 陈明光、邱敏：《六朝经济》，南京出版社，2010年，第384-390页。



源不断涌入沿海地区；二是稀有材质物品和工艺的输入，如象牙、玳瑁、珊瑚、海珠、香料、火珠等自然材质，或如金刚指环、摩勒金杯、琉璃唾壶、火布等各色工艺品^①。南京虽不滨海，却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相关，这里不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由西域至中土的枢纽或终端，而且是海上丝绸之路东延的出发地^②。可见以南京为中心的地区在当时海外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中应起到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秦汉时中外文化交流较多地表现为具有军事政治倾向的话，那么，六朝时期则有不同，它主要是宗教、艺术、学术思想和生活习俗等文化本身的交流，特别是都城建康逐步成为中外商货贸易的中心，这对于加强和发展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③因此，六朝墓室壁画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佛教题材的增多，很大程度上这应是印度佛教从海外诸国持续传入影响的结果。比如南朝大型画像砖墓中常见的宝瓶生莲，具有明显的佛教因素，其渊源就在古代印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印度巴尔胡特和桑奇大塔的栏楯上面，就雕刻了大量的宝瓶生莲装饰^④。此外，南朝的陵墓石刻天禄辟邪，以及石柱、石碑上线刻的袄教神王等形象，其渊源最早是来自于波斯，甚至通过波斯还可追寻到希腊风（“希腊式”的棱纹等），这是海外文化交流的成果^⑤。

隋唐，广州、泉州、宁波、扬州成为四大国际贸易港，其中广州尤为重要，唐朝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主要是以广州为起始的，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被分为从广州至大食国巴士拉港的东航路，抵达阿拉伯半岛及亚丁湾、东非、红海航道的西航路，以乌刺为

① 朱文涛：《六朝时期的海上交通与对外造物文化交流述略》，《创意与设计》2016年第5期。

② 张宁宁：《南京“中国明清城墙”及“海上丝绸之路”双线申遗项目的对比性研究与展望》，《改革开放》2015年第23期。

③ 胡阿祥、李天石、卢海鸣编著：《南京通史·六朝卷》，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76页。

④ 参见（日）八木春生：《中国南朝的莲花纹样》，日本《成城文艺》第143号，1993年，第106-144页。

⑤ 林树中编著：《六朝艺术》，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50-51页。



东西航路的交会点^①。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由盛转衰，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却持续繁荣，支撑唐代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基础在地方、在民间^②。宋元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时期，形成了泉州、广州、明州（宁波）三大贸易枢纽港，在促进东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③。福建泉州此时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东方重要港口，这可能是福建宋元壁画墓集中出现的一个外在因素。明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郑和先后七次率庞大的远洋舰队出访亚非各国，从而开辟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航程最长的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繁荣起来。但此时由于沿海地区墓室壁画的遗存不多，海上丝路文化似乎并没有直接对墓室壁画产生直接影响。郑和之后，随着中央政权海禁、闭关锁国等政策的实施，南海安全隐患逐渐显现，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衰落^④。

①（北宋）宋祁、欧阳修等编撰：《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2000年。

② 刘凤鸣：《唐中后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原因探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③ 李军：《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期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港口发展之比较研究》，《南方文物》2005年第1期。

④ 徐桑奕：《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南海管制式微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6期。